皇帝的经学阅读史*
——明代经筵《尚书》讲章与帝王之学的经典架构

时 鹏 飞

内容摘要:经书是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不同经书对于构成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尚书》是明代帝王之学的核心经典,皇帝受经筵讲官影响,采用择要选读的方式,着重阅读《尚书》部分篇目的部分章节,这种选择性阅读也是明代科举士子阅读经书的主要方式,相较于通读全经更能代表明代经学阅读的主流样态。经筵讲官通过去取讲授篇目、挑选讲授重心、引导诠释方向,实现对于经书现实政治意义的建构。经筵讲章提倡相权以分割皇权,通过经典诠释对皇帝的权力与道德施以约束,其背后隐含政治利益的考量。经书的现实意义生成涉及书籍的内容、阐释和阅读,只有将阅读在内的全部环节纳入考察,才能完全理解经书介入现实的过程与意义。

关键词:经筵讲章 明代皇帝教育 经学阅读史 《尚书》

儒家经典常被视为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构成的理论基石。明代早期的经史讲论活动和明代中期以后成为定制的经筵、日讲等讲学活动,是信仰儒家思想的讲官指导皇帝接受经学教育、塑造政治思想的核心环节,向来受到学界重视。

历史学研究经筵,偏重制度考证和史实梳理①,近年来亦有学者从经

*本文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明代经筵讲章汇编"(25047)阶段性成果。

①详参杨业进:《明代经筵制度与内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第79—87页;宋秉仁:《明代的经筵日讲》,《史耘》1996年第2期,第41—66页;张英聘:《试论明代的经筵制度》,《明史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97年,第139—148页;朱子彦:《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第122—(转下页)

学义理和出版文化的角度开辟经筵研究的新路径①,积淀了深厚且丰富的学术成果。综观既有研究,对于儒家经典如何借由经筵活动塑造君主统治思想和官方政治话语,尚缺乏深入探讨。这种局限,一方面源于现有明代经学研究"有一种淡化""经书的社会价值的取向"②,缺少观察经书如何进入现实的过程性视角;另一方面也缘于经筵讲章散见于文集之中,传世明人文集数量庞大,缺乏诸如《全唐文》《全宋文》这样的断代文章全集作为搜检依据,导致缺少宏观讨论明代经筵讲章政治哲学内涵的文献基础。笔者检阅 4000 余种明人文集,辑得 84 家经筵、日讲和东宫讲章。基于这些材料,结合文献记载,本文着重对以下问题展开探索:不同经书对于构成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尚书》何以能够成为明代皇帝教育的核心经典?一部经书之中,不同篇章的政治内涵各不相同,讲官通过掌控皇帝的阅读方式、设置阅读的重点篇目,意图指向现实政治中的哪些方面?其中又有怎样的政治利益考量?经典与现实处于不断互动的状态,经书不只是儒生学者的研读对象,也是深刻塑造现实世界的文化存在。阅读是书籍意义具体化的过程,只有进入皇帝的经学阅读史,才能充分理解经书发挥现实政治意义的过程与具体内涵。

一、《尚书》:明代皇帝教育的核心经典

不同经典对于皇帝具有何种意义?这一问题不仅体现于皇帝对每种经典的具体评价,也表现在皇帝学习经典的阅读过程与方式:优先阅读哪

(接上页)128 页;陈时龙:《天启皇帝日讲考实》,《故宫学刊》第十辑,故宫出版社,2013 年,第 155—166 页;谢贵安:《明熹宗经筵日讲述论》,《学习与探索》2015 年第 10 期,第 145—152 页;谢贵安:《明崇祯经筵日讲初探》,《人文论丛》总第 24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37—146 页;谢贵安:《明世宗经筵日讲阶段性特征述论》,《华中国学》总第六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07—118 页;包诗卿:《明代经筵制度新探》,《史学集刊》2017 年第 2 期,第 63—70 页;宋兴家:《明代经筵日讲进讲书籍考》,《故宫学刊》第二十七辑,故宫出版社,2024 年,第 20—31 页;以及朱鸿林的系列论文(收入《明太祖与经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等。

①详参朱鸿林:《高拱经筵内外的经说异同》,《明太祖与经筵》,第 333—352 页;刘勇:《经筵内外的〈大学〉文本异同》,《变动不居的经典:明代〈大学〉改本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第 198—255 页;等等。

②郭素红:《20 世纪以来明代〈尚书〉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第 206 页。

一部经书，着重阅读经书的哪一部分。明代经筵的经典讲授顺序，根据黄佐嘉靖年间的记载，是四书与五经同时进讲，四书先讲《大学》，五经先讲《尚书》："儒臣进讲，四书以《大学》为先，五经以《尚书》为先。"①讲官的记述也可与此参证，严嵩上奏谓："臣等昨秋所进书程，据旧仪，以《大学》与《尚书》每日并读并讲。"②方从哲拟定明熹宗的阅读计划，也是"《四书》起《大学》，《尚书》起《尧典》，每日讲读。先读《大学》，次读《尚书》"③。可见这是通行于有明一代的经筵讲读顺序。宋代以来，"重四书过于五经"④。四书之中，"先读《大学》……次读《论语》……次读《孟子》……次读《中庸》"⑤，这是朱熹确立的理学一贯的经书阅读顺序。因此，经筵先讲《大学》不难理解，但是同时进讲《尚书》，就不能不认为是考虑到皇帝的特殊身份，从而进行的阅读顺序调整。至于《尚书》之后诸经的阅读顺序，有明一代似乎并无一定之规。万历二十一年（1593），《礼记》即将讲完之际，首辅王锡爵提出："臣等又看得，经书之中有《诗经》、《孝经》二书，皆经先师孔子删定。《诗》得性情之正，《孝》为德教所先，以此进讲，庶乎博而有要……伏望皇上随意择讲一书，使臣等可以传谕诸臣，令其接续《礼记》之后，预撰讲章进呈。"⑥后来便以《诗经》接讲，之后又讲《春秋》，《孝经》最终未讲⑦。可见《尚书》之后诸经的学习顺序，并无事先的规定。如此安排体现出《尚书》在明代皇帝教育中独具一格的重要性，这点也可以从明代多位皇帝的陈述中得到印证，如明太祖即称："尧舜之道，载之《典》《谟》者，无以加矣。"⑧明神宗亦谓："《书经》乃为君之至要，何可一日不温习哉？"⑨不过这种总体评价很难作为《尚书》是

①黄佐：《翰林记》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61页。

②《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四，《明实录》第86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937页。

③《明熹宗实录》卷二，《明实录》第124册，第87页。

④钱穆：《朱子新学案》第4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

⑤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49页。

⑥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13—1114页。

⑦详参朱鸿林：《明神宗经筵进讲书考》，《明太祖与经筵》，第368—373页。

⑧《明太祖实录》卷七七，《明实录》第2册，第1410页。

⑨《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五，《明实录》第104册，第3667页。

皇帝教育核心经典的确据，想要确定何种经典对于皇帝最为重要，必须回到经筵教学历史现场的具体安排之中考察。

明代经筵、日讲分春秋两季，春季始于二月十二日，终于五月初二日；秋季始于八月十二日，终于十月初二日。经筵举行于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遇到恶劣天气暂停。其余时间举行日讲，风雨不辍。明代经筵、日讲讲书并非逐篇、逐章、逐句全部讲解，而是对于所讲篇目、段落有所选择，“经筵则摘经书要语为题……日讲则循序排日”①。经筵由阁臣和讲官挑选篇目、章节；日讲虽然按照经书内容顺序推进，但所讲篇目、章节亦经过挑选。例如万历年间讲读《礼记》，时为首辅的王锡爵就将《儒行》之后《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诸篇全部跳过不讲：“《儒行》而后有冠、婚等项六义，皆仪文器数之类，于理道不甚紧关，讲臣无可敷衍议论、陈献忠荩者。”②一篇之中，但凡无可发挥或涉及忌讳的章节字句一概跳过不讲，这种择要选读的方式至晚在弘治以前已成定例。当时言官多有以此为言者，弘治元年（1488），张文上言：“经史当无所不讲，不宜有所避讳。”③弘治五年，杨廉亦言：“其常日劝讲，不必拣择篇目。”④然而并无实效。直至明末，经书依然是选择性讲读，崇祯年间讲官姚希孟记载：“凡讲书史，遇词旨无甚关切及凶暴不祥宜避者，置勿讲。或越过一二章，或数章，例也。”⑤讲读篇章的选择权掌握在内阁手中，故而明思宗质疑讲官李孙宸讲授《论语》，何以“自‘子张问十世以下’至‘季氏旅泰山’，越七章讲将半”，李氏回答说“是阁中派定也”⑥。又如正统年间，周叙奉命讲授《冏命》“仆臣正”一节，即是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分派，且因杨溥对于讲章的议论持不同意见，于是改由其他讲官撰写另外章节的讲章进讲：“右《书经》讲章一通，叙先蒙先少保澹庵杨公分题撰进。

①钱振民编订，郑利华、陈广宏、钱振民主编：《李东阳全集》卷九三《讲读录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969页。

②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第1113页。

③《明孝宗实录》卷十，《明实录》第51册，第235页。

④《明孝宗实录》卷六五，《明实录》第54册，第1249页。

⑤姚希孟：《公槐集》卷三《讲帏记注》，《清閟全集》，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索书号：15184），叶三。

⑥姚希孟：《公槐集》卷三《讲帏记注》，《清閟全集》，叶三至四。

稿成而公见之,再三却不用……乃改命他讲官,撰别章以进。”①儒臣由此获得了决定皇帝阅读哪些经典内容的权力,进而可以通过重点讲授特定的篇章,塑造皇帝的思想观念。

职此之故,传世经筵讲章的讲书范围明显集中于部分经典的部分章节,分布呈现集聚性特征。这种数量差异不是缘于历史随机性,而是由于讲官讲授不同经书、不同篇目、不同章节的频次多寡导致。因此,统计现存讲章讲授经书及其篇目的频次,就能反映儒臣希望着重强调经书的哪些内容。宋兴家最早运用统计方法考察明代经筵书籍进讲情况,对于经书进讲差异已有揭示②。本文在文献搜集上相较宋文又有不少进展③,并从考察经书进讲差异推进到考察经篇进讲差异。本节首先统计收有经筵、日讲、东宫讲章的明人文集及其他著作含有诸经讲章的频次。某家文集之中含有某部经书的经筵、日讲或东宫讲章,即计为一次。统计当下可知的讲授某部经书的讲章家数多少,可见诸经在皇帝教育中重要性的差异。现将各经现存讲章家数列入表 1:

表 1　现存明代经筵、日讲、东宫讲章各经家数表

四书	讲章家数	五经	讲章家数
《大学》	18	《诗经》	15
《论语》	41	《尚书》	66
《孟子》	31	《周易》	11
《中庸》	25	《礼记》④	3
		《春秋》	6

①周叙:《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五,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 38 册,黄山书社,2013 年,第 98 页。

②宋兴家:《明代经筵日讲进讲书籍考》,《故宫学刊》第二十七辑,第 21—22 页。宋文依据的是“四库”系列丛书所收明代文集,所见讲官讲章总计 42 家,各经统计结果是《大学》7 家,《论语》19 家,《孟子》18 家,《中庸》15 家,《诗经》2 家,《尚书》41 家,《礼记》0 家,《周易》4 家,《春秋》5 家。

③本文主要依据《明别集丛刊》《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明人别集稿钞本丛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故宫珍本丛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日本所藏稀见明人别集汇刊》《日本所藏孤本明人别集汇刊》等大型丛书以及“四库”系列丛书所收明人文集,并结合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日本内阁文库等馆藏资源进行统计。

④《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宋代以后升格为独立经典,加入“四书”之列,故而本节将《大学》《中庸》与《礼记》分开统计。

讲章数量多寡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经典篇幅，二是重视程度。《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前者约 1800 字，后者 3500 余字。因此经筵虽然重视，但是分别仅有 18 和 25 家讲章存世。不过若以单篇而论，群经之中，无有过于《大学》《中庸》者。五经之中，《礼记》《春秋》显然不受重视，《诗经》的重要性较之宋代亦有所下降①。综合主观重视程度与客观讲授频率，可以判断，《尚书》在明代皇帝教育中具有超越诸经的核心地位，是构建帝王之学的核心经典。

《尚书》之所以有如此地位，固然因为发源于其中的德治、民本、天命、人心与道心、道统与政统等政治思想②，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宋代以来就被频繁施用于皇帝教育③，除此之外，《尚书》用作皇帝的教材，尚有不少其他优势。儒家的很多经典原本用于儒生师徒讲学，将其用于经筵讲学，经常需要强调其中的内容不仅适用于儒生，也可以推及皇帝。比如王直讲授《孟子》“事孰为大”一节，就说：“臣谨按：孟子此言，盖为学者而发，故止于事亲。若就君道言之，所系为尤大。”④又如马愉讲授《论语》“子张问仁于孔子”一节，亦谓：“这虽是一时告门人的说话，若从这里推广将去，帝王政事也不过如此。”⑤而《尚书》所载多是三代君臣的治国理念，即如宋儒蔡沈所谓“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⑥，用于教学，皇帝容易代入身份。比如何瑭讲解《益稷》，便以“仰惟皇上所居之位，即帝舜之位”⑦为切口，将经义解释与现实规诫绾合为一。

---

①关于宋代经筵讲读《诗经》的情况，详参王贞贞、舒大刚：《北宋经筵讲诗对宋诗学形成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第 77—84 页。

②本文意在还原明代儒臣通过经典构建国家政治哲学的思想理路，而非对于《尚书》政治思想历史年代的研究。故而对于伪古文《尚书》中的政治理念，比如出自伪古文《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出自伪古文《大禹谟》的“人心道心”等等，按照明儒的知识体系，将其视为三代以来的政治思想遗产。

③宋代经筵讲授《尚书》的情形，详参刘力耘：《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第 100—107 页；杨飞、钱宗武：《宋代〈尚书〉经筵教化研究》，《宏德学刊》第十五辑，商务印书馆，2022 年，第 117—130 页。

④王直：《西昌王抑庵集》卷八，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 33 册，第 462 页。

⑤马庆洲：《澹轩文集校注》卷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30 页。

⑥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卷首《九峰蔡先生书集传序》，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3 页。按，此处作者名从整理本著录，正文行文从学界常用写法。

⑦何瑭：《何文定公文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 95 册，第 22 页。

因此,便于皇帝接受是《尚书》能够成为帝王之学核心经典的重要原因。

另外,孟子以来的儒家将道统的源头上溯至三代帝王。使用《尚书》教学,便于讲官将本朝政权同三代以来的道统接续起来,进而将听讲的皇帝安置于道统的历史之中,对其发出圣帝明王的期待。魏校代桂萼撰《洪范》讲章,便谓:"自古皇极之君,惟有尧、舜、禹、汤、文、武……下此虽英雄如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自不免惭德,岂能表正万邦。今上天锡聪明,尊为天子,更愿德为圣人,布昭大中至正之道,宇宙俱在吾皇太和元气中,上下并受其福。"①

再者,政治文化的现实变迁也是《尚书》适于讲授的原因之一。明代皇权膨胀,君臣地位悬殊。在通行的政治话语之中,皇帝都是天纵圣明、睿智生知——"我皇上神明天授"②,"仰惟皇上英哲天纵,卓然三代以上之君"③,"仰惟皇上天植英姿"④。儒臣试图在这套话语体系之下,说服皇帝接受儒学教育,那就只好假借传说中三代圣君贤臣讲学求治的历史先例,证明经筵讲学的必要性。比如湛若水讲解《皋陶谟》,便谓虽以舜之圣明,"然皋陶陈谟于帝舜之前,犹若是其谆切,如严师友在一堂之上者,何耶?盖帝舜不知己之已圣而忘乐善之诚,故皋陶不以舜之至圣而忘敬谨之规,此有虞之治所以后世莫及也"⑤。陈循亦谓:"皋陶不以其君已圣而废责难之恭,帝舜不以其治已至而忘警戒之意。"⑥因此,即使天生圣明,讲学之功也必不可少。

最后,君前进言,忌讳繁多,有的话题比较敏感,比如天命的无常或亡国的危险,早期儒家经典原本直言无忌,而到近世由于君权畸重,变得不便讨论。但在经典讲授的外衣之下,儒臣可以直言国家危亡、天命不再的可能,比如刘翊讲解《大禹谟》"天禄永终"一句,便说:"若人君心或不善,

---

①魏校:《庄渠先生遗书》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18 册,黄山书社,2016 年,第 127—128 页。

②韩日缵:《韩文恪公文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 70 册,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42 页。

③魏校:《庄渠先生遗书》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18 册,第 132 页。

④张四维:《条麓堂集》卷十,张四维撰,张志江点校:《张四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237 页。

⑤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内编》卷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 83 册,第 229 页。

⑥陈循:《芳洲文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 35 册,第 196 页。

必然有不善的政事。或穷兵黩武,或暴征横敛,劳民之力,伤民之财,使海内之民,父子兄弟流离冻饿,愁叹嗟怨。上天必然震怒降灾,由是人君的天禄永远断绝了,再不得享用。”①且这种有限的自由受到制度保障,万历年间的经筵讲官郭正域于其所编《皇明典礼志》即谓,经筵、日讲“直陈时事而不讳,敷奏兴衰而不为忌”②。只是由于讲官的谨小慎微和皇帝的喜怒无常,这种自由和保障很多时候都形同虚设而已。

明确内阁对于经筵活动的主导地位以及《尚书》作为明代皇帝教育核心经典这两项前提,便可以顺此考察经筵讲官如何通过管控皇帝的经书阅读内容与方式,输出特定的价值理念。

二、皇帝的经书阅读方式

儒学通常默认一部经书之内或不同经书之间,存在思想脉络上的一贯性。然而由于不同经典成书年代的不同、文本性质的差异和思想内涵的复杂性,这种理论统一性很多时候只是儒生一厢情愿的理想,或是理论家主观构建的体系。即使同一部经典,也可以引申出具有相反指向的主张,孙承恩讲解《尚书·无逸》就指出:“周公于《无逸》篇说文王如此其劳,至《立政》篇说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则又如此其逸。”③讲官充分利用经典内涵的多元性,根据各自的意图,称引、讲解不同的篇章,提出不同的主张。比如魏校劝戒嘉靖初年求治太急的明世宗,便援引《大禹谟》“临下以简,御众以宽”说:“皇上思虑太多,励精太急,故于不急之章奏,无益之文义,亦或留神,恐非养德养身之道也。”④建议皇帝涵养内心,惇大成裕,不必急于求治。而曾朝节为怠政多年的明神宗讲解经书,则引述《无逸》的典故,劝谏皇帝不要深居法宫,应当经常接见大臣,谓:“仰惟皇上总揽乾纲,而权无旁落;洞晰民隐,而几察幽微。所以纲纪天下,真无少懈矣。然静摄既久,则群臣之接见无由;听览一稽,则庶司之施行或滞。凝神于宥密,孰若间与公卿咨访得失尤相儆惕也;默存于渊

①刘翊:《古直先生文集》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册,第47页。

②郭正域:《皇明典礼志》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8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③孙承恩:《孙文简公瀼溪草堂稿》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22册,第547页。

④魏校:《庄渠先生遗书》卷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18册,第141页。

微,孰若下与儒彦谈论道理尤相激发也。”①

由于前述经筵讲书越篇、越章讲读方式的存在,现存经筵讲章分布很不均匀,有些篇章甚至段落讲述者甚多,而有些篇章则不见讲章传世。因此,考察现存经筵讲章集中于经书的哪些篇目、哪些章节,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儒臣带领皇帝着重阅读哪些篇目、哪些章节,进而反映儒臣试图向皇帝传输哪些治国理念和政治思想。

本节仅统计现存明代经筵讲章讲授《尚书》各篇的频次,而不计入日讲和东宫讲学讲章。因为明代日讲和东宫讲学的常规体例是“先训字义,后敷大义而止”②,只有文字训释和经义概括两个环节,主要任务在于解经,难以窥见讲官授课背后的深层意图。经筵讲章于字义训释、经义概括之外,通常多出理论推阐和现实联系两个环节③,是对经文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进一步阐发,借此才能看到讲官如何将经典解释引向政治讨论,以及引向哪些具体的政治问题。其次,经筵讲官人员数量多④,讲学次数少,故而讲章比较离散地分布于诸家文集之中,并且各集大多只有数首或十数首,符合统计数据所需要的随机性特征。日讲或东宫讲学由于讲官数量少、频次高、时间连续且讲章篇幅短小,故而有的讲官讲章保留比较完整,一人多达数十首乃至数百首⑤,可能会因为少数异常值的存在,造成最终统计结果失效。虽然从皇帝的知识积累而言,日讲或许“非经筵月讲所能比拟”⑥,但经筵是国家大典,“国家经筵之设,其盛矣乎!

---

①曾朝节:《紫园草》卷九,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万历刻本(索书号:402.6 12692),叶十二至十三。

②高拱:《日进直讲序》,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37页。

③关于明代经筵讲章的体例,参见朱鸿林:《申时行的经筵讲章》,《明太祖与经筵》,第391—392页。朱氏将经筵讲章体例概括为讲题、解题、释文、阐析、中结、推论、联系和结句八个部分,本文着重讨论其中释文、阐析、推论、联系四个核心内容环节,对于讲题、解题、中结、结句等格式化环节不纳入讨论。

④郭正域《皇明典礼志》卷十三曰:“经筵讲官凡十有六,词臣皆得与。日讲讲官惟六,不轻与。”(《续修四库全书》第824册,第139页)

⑤比如王傧的《尚书》日讲讲章有50首,收入《王文肃公集》卷六;王家屏的《论语》日讲讲章有70余首,见于《复宿山房集》卷七至卷八;程敏政的《尚书》东宫讲章有140余首,见于《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三至卷四。

⑥杨业进:《明代经筵制度与内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第81页。

天子自正朝辇御文华,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环列以听。经筵一开,天下欣欣焉传之,以为希阔之典”①,从象征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说,更具有代表性。兹将笔者所见现存明代《尚书》各篇讲章的数量列入表 2②:

表 2　现存明代经筵《尚书》各篇讲章数量表

篇名	讲章数量	篇名	讲章数量	篇名	讲章数量
尧典	4	太甲中	3	召诰	3
舜典	13	太甲下	3	无逸	7
大禹谟	13	咸有一德	4	君奭	8
皋陶谟	5	说命上	7	立政	6
益稷	6	说命中	7	周官	5
禹贡	2	说命下	5	君陈	4
五子之歌	2	泰誓下	1	康王之诰	1
胤征	2	武成	3	毕命	4
仲虺之诰	2	洪范	13	冏命	3
汤诰	1	旅獒	6	吕刑	1
伊训	3	大诰	1		
太甲上	3	康诰	6		

《尚书》中有些篇目受到经筵讲学的欢迎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虞廷十六字”,被理学视为三代以来帝王心法的权威表述。朱熹云:“尧舜禹所传心法,只此四句。”③经筵重视此篇,取意正在于此。郭正域所撰讲章即谓:“此十六字,是万世心学之源,千圣万圣,道统之传,实始于此。”④专制时代,君主的一个微小念头无不牵动巨大的现实利害,方鹏所谓“人君于端居静

①王鏊:《震泽先生集》卷二十《讲学篇》,王鏊著,吴建华点校:《王鏊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92 页。

②表 2 统计所据资料详见文末附表。

③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七八,第 2017 页。

④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四辑第 81 册,黄山书社,2016 年,第 172 页。

处之时,志之所存者甚微,而关于生民之休戚则甚大也”①。儒臣强调君主上承三代帝王心法,虽然不免迂远不切事情,但也确有现实政治的实效,故而经筵重视此篇也就不难理解。又如《尧典》《舜典》原是割裂今文《尧典》而成,通过追溯三代历史,成功构建出儒家政统的源头。儒臣通过相关文字的讲解,便能将当下政治与儒学政统联结起来。毛纪讲《尧典》云:“帝尧是古来第一个圣人,《尧典》是《尚书》中第一篇书……仰惟皇上聪明天纵,德器夙成,践祚以来,圣政日新,人心悦服,其于帝尧之德业,信可以优为之而无难矣……所谓放勋之盛,将不在于唐尧,而在于陛下矣。”②再如《洪范》篇中提出的洪范九畴,涉及五行、八政、皇极、三德、五福等重要政治哲学理念。蔡沈谓:“洪范九畴,治天下之大法……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于此哉?”③受到经筵青睐也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有些篇目受到经筵重视的原因,就并不如此容易理解,在其背后有着隐微深曲的政治权力博弈,这点留待下节详论。

《尚书》58篇之中,另有24篇目前未见经筵讲章传世,分别是《甘誓》《汤誓》《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上》《泰誓中》《牧誓》《金縢》《微子之命》《酒诰》《梓材》《洛诰》《多士》《蔡仲之命》《多方》《顾命》《君牙》《文侯之命》《费誓》《秦誓》。有些篇目十分冷门,缘于内容比较敏感,比如《汤誓》《牧誓》都是以臣伐君的誓词,《金縢》记载成王、周公的关系十分微妙,《顾命》涉及君主的死亡等等,在君权膨胀的年代,难以用作皇帝教育的教材。

非但皇帝的经学教育对篇目有所选择,明代科举士子的经学阅读也是如此。明清学者经常批评科举士子不读全经,对于经书内容完整性缺乏尊重,并将这种现象归咎于科举考试导致的功利风气。比如明人周弘祖《酌议从祀先贤疏》云:“近以士人多习活套,罕读全经。”④黄宗羲于士子不读全经的具体做法亦有详悉记载:“科举之学,力能亡经……变风变雅,学《诗》不知;丧吊哭祭,学《礼》所讳;崩薨卒葬,《春秋》不载。”⑤这种

①方鹏:《矫亭存稿》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6册,第157页。

②毛纪:《鳌峰类稿》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79册,第22页。

③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卷四《洪范》,第162—163页。

④贾三近辑:《皇明两朝疏抄》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465册,第628页。

⑤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朱康流先生墓志铭》,黄宗羲著,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2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标点略有改动。

由于科考出题的避讳和偏向引发的选择性阅读,不但形式上与皇帝经筵、日讲选读经书的方式颇为相似,而且内容上也与经筵重点讲读的篇目高度重合。关于明代五经考《尚书》的举子只读部分篇目的经学阅读情形,以顾炎武的批评最具概括性:

>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①

今人侯美珍统计明代乡试、会试的《尚书》出题情况,发现罕见出题篇目包括《甘誓》《五子之歌》《汤誓》《盘庚中》《盘庚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金縢》《微子之命》《多士》《蔡仲之命》《多方》《顾命》《费誓》《秦誓》20 篇②。这些篇中仅《五子之歌》现存经筵讲章 2 首,《泰誓下》现存经筵讲章 1 首,其余都未见经筵讲章传世。经筵罕见讲读与科举罕见出题的《尚书》篇目重合度颇高。专制时代的政治现实之下,皇帝与士子的地位或许天差地别,但是不宜提倡阅读的经书内容则高度一致。

综合乡、会两试,科考出题最为热门的篇目从高到低前九名依次是《洪范》《大禹谟》《益稷》《禹贡》《舜典》《立政》《说命下》《皋陶谟》《吕刑》,《周官》《毕命》并列第十③。居首的《洪范》《大禹谟》也是经筵讲学频次最多的篇目,其余各篇的现存经筵讲章数量也大多在 4 首以上,唯《禹贡》仅有 2 首,《吕刑》仅有 1 首,呈现出明显差异。究其原因,《禹贡》介绍九州地理形势及其物产,对于君主来说相关知识过于具体细碎,难以转化为政治智慧,故而篇幅虽长,但讲者不多。《吕刑》的主要内容是“吕

---

①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945—946 页。

②侯美珍:《明代乡会试〈尚书〉义出题考察——以考官出题偏重为主的讨论》,《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 47 期(2015 年),第 157 页。

③侯美珍:《明代乡会试〈尚书〉义出题考察——以考官出题偏重为主的讨论》,《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 47 期(2015 年),第 152 页。

侯为天子司寇,穆王命训刑以诘四方”①,对于君主来说,刑罚之事过于具体;但对于试图加入官僚队伍的士子而言,则应重视学习。经筵与科举的热门篇目大体重合,少数差异可以从君主与士子的身份差异获得解释。由此或许可以重新审视明代经书阅读的一般样态:无论是政治顶层的皇帝,抑或是知识阶层下端的科举士子,对于经书,特别是五经,大多没有通读全经,而是依照现实需要,有侧重、有选择地进行阅读。强调通读全经,反对拣择篇目,比如尹襄批评“于经有所拟议差择,而圣人之言几同戏玩……《诗》略变风、变雅而不讲,《礼》不习《丧服》,《春秋》避崩薨”②,曹安反对“《书》读《禹贡节要》,《诗》不读变风、雅,《春秋》不详崩薨卒葬,《礼记·丧服大记》等多不考……经有节文……以为一切目前苟且速成之计”③,只是居于两端之间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品味,不能代表时代主流的经学阅读样态。

三、经书现实政治意义的构建

明代经筵的教育理想是通过培育君主的道德,推及政事,实现三代之治,陆简进讲《大禹谟》就说:“盖人君之德,不徒善其一身,要施于政事,无不尽善;人君之政,不专在乎法令,要安养兆民,无不得所。”④对于经书文义的研习并非主要目的,焦竑所谓:“我朝经筵日讲,非徒辩析经史为观美也,谓当旁及时务,以匡不逮。”⑤过于细致的辨析讲解甚至为某些讲官所反对,嘉靖年间的讲官魏校所撰《孟子讲义》就说:“皇上……日御经筵,讲琐碎之文义,虽勤何补?……今日所当急者三,一曰明实学,谓将圣人切要言语实践诸身,而发挥于政事,不可效书生寻章摘句。”⑥经典学习的最终归宿是国家治理,因此对于皇帝教育及其阅读史的研究必然导向这一问题:经筵讲官通过带领皇帝重点阅读经书的特定章节内容,意图指向现实政治中的哪些方面?经筵制度发端于宋儒,理学又是明代的官学,

①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卷六《吕刑》,第286页。

②尹襄:《巽峰集》卷九,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13册,第628页。

③曹安:《谰言长语》,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本(索书号:A00473),叶三。

④陆简:《龙皋文稿》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60册,第32页。

⑤焦竑撰,李剑雄点校:《焦氏笔乘》卷三,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页。

⑥魏校:《庄渠先生遗书》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18册,第135页。

故而经筵讲学主要包含早期儒家和程朱理学的政治理论内容。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本节尝试揭示的是,在明代的历史情境之下,经筵讲官的教学活动包含着特殊的政治利益考量:讲官通过对经书内容的选择性重构,提倡相权以分割皇权,在此意义上,经筵讲章可以视为明代相权的集中表述。这是此前学者未曾加以留意的重要内涵,故而本节着重予以阐发。

明代继承蒙元的政治制度遗产,君臣地位悬殊,“君尊臣奴在名义上当然已改变了,但君尊臣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①。明太祖废除宰相,进一步清除君权的制度限制。明代早期的经筵讲章,对于废除宰相大多积极拥护,并以经义与之相证,彭华讲解《尚书》中的《周官》,便举《周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六卿并立为例,批评后世“以六卿为省属”,进而称颂明太祖废除中书省、直辖六部的英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仿佛成周之法,斟酌古今之宜,建立诸司,分理庶务,彼此颉颃,不得相压,事皆朝廷总之……历考近代官人之法,未有若今日之善者也,其视成周,真可以无愧焉。”②程敏政讲解此篇,亦谓:“秦、汉、唐、宋以来,乃设宰相之官,六卿反为所属……仰惟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后,斟酌虞、周二代之制,内罢宰相,设六部以准六卿……诚足以行之万世而无弊矣。”③但是随着明代内阁权力的扩张,“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④,经筵讲学又是内阁及其下属的翰林院等部门主导的教育活动,因此经筵讲章的核心政治主张之一便是陈述君臣共治的必要性,尤其是特别强调阁权的重要性。

君臣共治是经筵讲学着重提倡的政治理念,比如程敏政讲授《立政》,就说:“人君一身不能独治,必须委任贤才,与之共治。”⑤尹襄讲解《说命中》,亦谓:“天下至大,非一人所能独治,必须众官分理庶务。”⑥共治势必意味着皇帝让渡部分政治权力,而其出让权力的对象,经筵主要强调的是内阁。由于明太祖有“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

①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9页。

②彭华:《彭文思公文集》卷一,上海图书馆藏明弘治刻本(索书号:827786-95),叶三三至三四。

③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八,程敏政著,阮东升校点:《程敏政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75页。

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条,黄宗羲著,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8页。

⑤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程敏政著,阮东升校点:《程敏政文集》,第95页。

⑥尹襄:《巽峰集》卷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13册,第583页。

有奏请设立者……凌迟,全家处死”①的遗训,经筵讲章大多采取迂回策略,并不直言宰相,而以辅臣、辅相、辅弼等词代之。置诸明代的历史语境下,其实不难看出所指便是内阁。

由上述思路出发,便很容易理解一些篇目何以特别受到讲官的青睐。比如《说命》三篇,讲的是“史臣记高宗得傅说的事”②。殷高宗积极求贤,以致梦到天帝赐予辅臣,根据形象旁求天下,终于找到傅说,“立以为宰相,而任之极其专”③,天下因以大治。刘球、申时行、马愉等人讲授此篇,均以君臣一心为说。马愉谈到殷高宗“至再求助于辅臣者如此”,提出:“为大臣者,必能辅君成德,然后能安天下。然君臣之间,必诚意交孚。”④尹襄讲道:“人君非有贤良之臣以辅相之,则聪明无启发之益……为臣不以尧、舜望其君,皆不足以言治。”⑤而陆简更是直言:“故昔人谓人主之职,在于择相,宰相得人,则君德自正。君德既正,则天下之治自成……今宰衡之设,虽显无专命之员,而保傅卿佐之臣,侍从儒学之士,俨列左右,亮采代言,实隐然寄辅相之职也。”⑥明白提出现今的内阁大臣及其辖属的翰林院官员履行的便是过去宰相的职任。

此外,经筵还有一些常见的主张,诸如君主应当委任大臣,而非小臣,童承叙云:“所谓用人者,非人人而用之也,亦在乎慎择大臣而已。”⑦又如应当任用老成,而非新进,程敏政所谓“人君之治天下,任用老成是第一件事”,反对亲信“新进浮薄之人”⑧,其实都是变相为阁权张本。旁参以其他诸经的讲章,就更能看出提倡相权是经筵讲学的核心政治理念,贯通于不同讲官所阐释的不同经典之中。严嵩讲《论语》道:“得人以任职,得一相以辅政,则百司庶务自然修举,人主惟恭己南面而无所劳矣,岂屑屑

①朱元璋:《皇明祖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64 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167 页。

②刘球:《两溪文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 38 册,第 274 页。

③彭华:《彭文思公文集》卷一,叶五。

④马庆洲:《澹轩文集校注》卷一,第 57—58 页。

⑤尹襄:《巽峰集》卷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13 册,第 582 页。

⑥陆简:《龙皋文稿》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 60 册,第 34 页。

⑦童承叙:《内方先生集》卷八,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54 册,第 239 页。

⑧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八,程敏政著,阮东升校点:《程敏政文集》,第 173—174 页。

然用心于非所当用之地哉!”①魏校讲《大学》谓:“君之职,惟论一相而已,若得一个好辅相大臣,则群臣个个都好。”②都是如此。

对于经筵经典诠释的现实指向,时人已经有所察觉。比如嘉靖十二年(1533),讲官廖道南讲解《说命》,谓:“然必有高宗之圣,而后可以用傅说之言;必有傅说之贤,而后可以辅高宗之德。不然,则莽、操、懿、温之流,又将以冢宰借口于千万世矣。”③引起首辅张璁的震怒④。甚至有的讲章没有提倡相权的意图,只是经典诠释疑似献媚阁臣,便为言官所劾。黄景昉《宦梦录》载:“《尚书·金縢篇》议讲非便,罢之。上不可,谕云:‘讲此见上世君臣一体之谊。’其后劾首揆罪指是,谓特令讲《金縢》,屡举周公以自尊大,并訾讲官为阴有所媚,初不知出自上意也,枉诬人不浅。”⑤

经筵提倡相权的政治立场缘于承担经筵讲学的官员大都具有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等衙门的工作经历⑥,而在明代中后期,翰林院等衙门的官员已与阁臣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⑦。反对相权扩张的官员亦有就此发难者,嘉靖四年,并无讲职的兵部左侍郎胡世宁专门以经筵讲章形式上奏,解说《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一节,特别强调君

---

①严嵩:《钤山堂集》卷二四,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11册,第212页。

②魏校:《庄渠先生遗书》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18册,第131页。

③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五,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11879),叶六。

④按,张璁事后对吏部尚书汪铉说,廖道南所言冢宰,是指吏部尚书。这是意在挑唆的故意曲解,是以廖氏后文言“乃谪道南于徽,正欲铉反噬也”(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五,叶七)。后世六部建制,名义上取法《周礼》六官,故以冢宰为吏部尚书之别称。但是先秦文献中的冢宰约当后世宰相之职,《说命上》谓“爰立作相”,《说命中》伪孔安国注谓“在冢宰之任”(《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尚书正义》卷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故而前引彭华、尹襄、陆简诸人讲解此篇,都是言辅相或宰相。廖道南先后讲解《大学衍义》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元载、卢杞、李逢吉诸章,都是唐代权相,也为张璁所不满。廖氏屡言前代奸相,其实就是针对张璁。

⑤黄景昉:《自叙宦梦录》卷四,黄景昉撰,朱曦林点校:《宦梦录　馆阁旧事》,中华书局,2022年,第109页。

⑥详参谢贵安:《明代经筵和日讲讲官的选任条件》,《明清论丛》第十五辑,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26—28页。

⑦详参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0—80页。

主独揽大权的重要性，重申《皇明祖训》对于宰相的厉禁，中云："不知自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称为首相……限定翰林院官必是进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系内阁取中教养之人为其门生者方得选用。吏部不得拟其升黜，亦不许擅升外职，使之历练民事，稍涉干计辛苦。又占定礼部尚书、侍郎职事优闲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紧要衙门，必用翰林一人。其余内外官员，虽有文学才猷出众者，不许再如祖宗朝选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许推入内阁。是皆私讹相传，谬称旧制，以欺后进，以箝众口。"①抛开内容不谈，采用讲章的形式本身就暗含解构内阁话语权的意味。职官制度的权力结构决定了讲官的利益和立场，而其立场又左右了经筵讲章对于经书的诠释走向。政治现实和经典诠释在此息息相关，抛开现实背景就无法充分理解经筵经学的全部宗旨与关怀。

主张臣权、提倡阁权的另一面是限制君权。经筵讲官并不主张从法律上对于君主权力加以限制，但是希望通过经筵的道德教育，树立皇帝的政治责任意识。政治责任是经筵讲官解经的又一关键词，比如林文俊讲"人君以一身居天下之上，治乱安危，系于一人，其责至重"②，廖道南讲"人君者，天之元子也，今王受元子之责于天"③，张璧讲"君臣之责任"④，申时行讲"天之立君，既与之以崇高富贵之位，则必寄之以治教君师之责"⑤。程敏政更强调国家政治的责任主体是皇帝，反对"政化不洽而移咎于民，和气不臻而归罪于岁"⑥。但是由于缺乏制度的约束，道德责任的限制显得十分疲弱无力。尤其对于大权独揽的皇帝，"人君以至尊之势独处于上，以可致之欲毕陈于前，其心尤为易动，而养之其功愈难"⑦。因此，经筵讲官需要抛出一个超越物质欲望的终极诱惑，促使皇帝约束自

①胡世宁：《少保胡端敏公奏议》卷五，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14073），叶三十三。

②林文俊：《方斋存稿》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12 册，第 528 页。

③廖道南：《玄素子集》第 15 册《玄素子讲幄集》，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113700），叶十二。

④张璧：《阳峰家藏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 95 册，第 266 页。

⑤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三九，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三辑第 69 册，黄山书社，2016 年，第 160 页。

⑥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程敏政著，阮东升校点：《程敏政文集》，第 98—99 页。

⑦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三九，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三辑第 69 册，第 158 页。

己的道德。这点可以从讲官对《无逸》的常用阐发路径得到证实。

《无逸》一篇的主旨原本是“成王初政,周公惧其知逸而不知无逸也,故作是书以训之”①。其中谈到殷中宗、高宗、祖甲在位长久,后来君主大多享年不永,蔡沈云:“耽乐愈甚,则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寿而恶夭。此篇专以享年永不永为言,所以开其所欲,而禁其所当戒也。”②这原本只是篇中一节之义,但是讲官讲解此篇大多喜欢抓住这点发挥,比如彭华谓:“夫逸乐,人所好也。然所好有甚于逸乐者,寿也。”③孙承恩亦谓:“文王德为元圣,寿及百年,子孙千亿,延祚八百,其根本只是纯一之心,缉熙之学,应验到此。”④究其原因,正如张衮所说:“周公历叙三宗,惓惓以享国永久为言,盖本人情而为之劝沮也。”讲章抓住人性对于长寿的渴望,进而寄望皇帝“德业日隆,眷命用懋,而一人有庆,万寿无疆”⑤。全篇着重发挥德能益寿之意,终末归于万寿无疆的颂祷,结构堪称巧妙,但是实效恐怕非常有限。君权极度膨胀的时代,儒臣极力找出经书的各种切口,试图在经典的外衣下对皇权施以有限的约束。即使这种努力最终收效甚微,仍是作为思想遗产的儒家经典与现实权力最直接、持久的交锋。

结论

教育中的阅读行为必然带有规训的维度,即使专制时代的君主也无法规避。正如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说:“阅读行为被某些拥有特权的人通过对书本的使用而悄悄建立了起来,他们才是‘真正’的阐释者。”⑥皇帝的经学阅读并非直面《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五经大全》等官定权威注本,而是通过经筵讲官的转述与重构完成。经筵讲官通过筛选皇帝阅读经书的篇目、章节,以及对经书诠释的刻意引导,成功将经典阅读转化为具有现实意图的政治思想培育。但是,人类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并非全部来自教育和阅读。随着政治经验和阅历的积累,

①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卷五《无逸》,第227页。

②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卷五《无逸》,第230页。

③彭华:《彭文思公文集》卷一,叶二十一。

④孙承恩:《孙文简公瀼溪草堂稿》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22册,第547页。

⑤张衮:《张水南文集》卷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38册,第43页。

⑥[法]塞托著,方琳琳、黄春柳译:《日常生活实践 1.实践的艺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5页。

皇帝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中的大权在握,“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始而惭焉,久而安焉……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①。经学教育微弱的道德规训相较于政治现实中强烈的权力感知显得微不足道,很多君主年长以后便逐渐退出经筵学习,或者视为具文。对于讲官的老师身份,经常只有仪式上的尊重,有时甚至缺乏基本的礼敬,乃至近乎亵侮:“景泰初,开经筵……相传云,是时每讲毕,命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有识者病其媟渎。”②经典与政治的交互过程是儒教国家权力分配与平衡的重要环节。经书并非一成不变的历史遗产,也不只是经学家书斋中的研究对象,经学研究不应只有关于经书本身及其诠释史的研究,也应注意经书对于国家与社会具有的现实影响和意义。经书进入现实发生于每个读者的阅读过程之中,读者的身份、阅读的方式与过程都对经书最终生成的现实意义具有重要影响。只有进入阅读的过程,才能真正理解人与书联结的意义。

附表

现存明代经筵《尚书》讲章篇目表③

讲官	出处	篇目
陈循	《芳洲文集》卷一	《冏命》《皋陶谟》《益稷》
周叙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五	《冏命》
刘球	《两谿文集》卷一	《舜典》《大禹谟》《禹贡》《说命上》《说命下》《洪范》《召诰》《立政》
马愉	《马学士文集》卷一	《尧典》《禹贡》《洪范》《皋陶谟》《说命上》
商辂	《商文毅公文集》卷一	《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太甲上》《太甲中》《咸有一德》《仲虺之诰》
柯潜	《柯竹岩集》卷一	《大禹谟》
王偰	《王文肃公集》卷五	《舜典》、《说命下》两首、《洪范》两首

①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条,黄宗羲著,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2页。

②黄瑜撰,魏连科点校:《双槐岁钞》卷七“金钱银豆”条,中华书局,1999年,第124页。

③讲官文集中的经筵《尚书》讲章,通常一篇经文只有一首讲章,一篇经文有多首讲章的只是少数。本表对于一篇仅有一首讲章者只著篇名,对于一篇而有多首讲章者标明数量。

续表

讲官	出处	篇目
刘翊	《古直先生文集》卷七	《舜典》两首、《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彭华	《彭文思公集》卷一	《太甲上》《说命上》《泰誓下》、《洪范》两首、《旅獒》《无逸》《君奭》《立政》、《周官》两首、《君陈》《吕刑》
郑纪	《东园文集》卷一	《伊训》两首、《太甲中》
陆简	《龙皋文稿》卷二	《舜典》《大禹谟》《说命上》
倪岳	《青溪漫稿》卷十	《周官》
程敏政	《篁墩先生文集》卷五、卷八	《舜典》两首、《立政》两首、《君陈》《尧典》《武成》《君奭》《周官》《毕命》
李东阳	《讲读录》卷一	《康王之诰》《说命下》
张天瑞	《云坪集》卷一	《洪范》《旅獒》
刘忠	《少傅野亭刘公遗稿》卷一	《立政》《毕命》
顾清	《东江家藏集》卷三二	《大禹谟》
蒋冕	《重刻蒋文定公湘皋集》卷十二	《毕命》
毛纪	《鳌峰类稿》卷二	《尧典》、《舜典》两首、《君陈》《冏命》
靳贵	《戒庵文集》卷二	《君陈》《毕命》
贾咏	《南坞集》文卷十	《伊训》
湛若水	《甘泉先生文集》内编卷三	《大禹谟》《皋陶谟》《无逸》
王九思	《渼陂集》卷七	《大禹谟》
费宏	《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七	《舜典》《大禹谟》
胡世宁	《少保胡端敏公奏议》卷五	《洪范》
方鹏	《矫亭存稿》卷一	《旅獒》
张璧	《阳峰家藏集》卷一	《舜典》、《大禹谟》两首、《咸有一德》
何瑭	《何文定公文集》卷一	《益稷》
陆深	《俨山文集》卷三三	《旅獒》
崔铣	《洹词》卷二	《说命上》
王教	《中川遗稿》卷十八	《君奭》
严嵩	《钤山堂集》卷二四	《洪范》

续表

讲官	出处	篇目
孙承恩	《孙文简公瀼西草堂稿》卷七	《洪范》《无逸》
费宗	《费钟石先生文集》卷八	《舜典》《大禹谟》《太甲下》《说命上》《武成》《洪范》
魏校	《庄渠先生遗书》卷一	《康诰》两首、《说命中》
董玘	《中峰集》卷一	《说命中》
尹襄	《巽峰集》卷六	《说命下》《说命中》
林文俊	《方斋存稿》卷一	《益稷》《洪范》《武成》《旅獒》《大诰》、《康诰》三首、《召诰》《君奭》
张衮	《张水南文集》卷三	《无逸》两首、《君奭》两首
姚涞	《明山先生存集》卷二	《君奭》
廖道南	《玄素子讲幄集》卷一	《无逸》《康诰》《召诰》
童承叙	《内方先生集》卷八	《立政》
程文德	《程文恭公遗稿》卷一	《无逸》
王用宾	《三渠先生集》卷五	《君奭》
赵贞吉	《赵文肃公文集》卷九	《大禹谟》
李春芳	《李文定公贻安堂集》卷一	《尧典》
马自强	《马文庄公集选》卷四	《太甲下》《咸有一德》《说命中》
张四维	《条麓堂集》卷十	《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太甲上》
	《条麓堂续集》卷二二	《说命中》《旅獒》
申时行	《赐闲堂集》卷三九	《仲虺之诰》《汤诰》《太甲中》《太甲下》《说命上》《说命中》《洪范》
王家屏	《复宿山房集》卷十一	《咸有一德》《周官》
张鼐	《宝日堂初集》卷三	《皋陶谟》
吴宗达	《涣亭存稿》卷十五	《舜典》
陈仁锡	《无梦园初集》有集	《益稷》
孟绍虞	《绀雪堂集》卷十一	《说命中》

【作者简介】时鹏飞，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明代文献与文化、明清文学与社会。